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2.013

从“新国民”到“美术人” ——梁启超典型思想探赜

杨 旭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梁启超的典型思想主要包括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形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典型化手法等四方面的内容,其发展以1917年的欧洲游历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阶段(1896—1917),其立足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视野,注重向西方学习,以培养新国民为宗旨;后期阶段(1918—1928),其立足于文明比较的世界视野,重评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以培育美术人为目标。梁启超前后两个阶段的典型思想虽具体内容与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启蒙理想、人格培养始终是其核心要素,发展脉络具有内在连续性,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进特征。其典型思想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 梁启超; 典型思想; “新国民”; “美术人”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2-0106-08

引用格式: 杨 旭. 从“新国民”到“美术人”: 梁启超典型思想探赜[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2): 106-113.

From “New Citizen” to “Aesthetic Person”: An Exploration of Liang Qichao’s Typical Thoughts

YANG X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Liang Qichao’s typical thought mainly include four asp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literary im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roups and typification techniques. Its development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with his European travel in 1917 as the boundary. In the early stage (1896-1917), it was based on the national vision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and striving for survival, paying attention to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nd aiming at cultivating new citizens. In the later stage (1918-1928), it reevaluate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aimed at cultivating artists based on the world vision of civilization comparison. Although the typical thoughts of the two stages have their ow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ontents and emphases, the enlightenment ideal and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are always the core elements, and the

收稿日期: 2022-10-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典型理论研究”(CX20210445)

作者简介: 杨 旭(1991—), 男, 陕西商洛人,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

development context has internal continuity, showing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rather than change”, which jointly laid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Chinese typical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Liang Qichao; typical thought; “new citizen”; “aesthetic person”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典型理论的相关论述,现代典型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刻画共性和个性统一的人物形象,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用概括、对照、细节描写、倾向性等典型化手法;运用美学的历史的和谐统一的评价标准。

清末民初是中西思想碰撞、新旧文化更迭的转折期,梁启超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政治活动家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典型思想,其主要包括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形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典型化手法等四方面的内容。与现代典型理论相比,梁启超的典型思想是粗略的、不成熟的,但其中已含有许多与现代典型理论相通、相近的思想,凝结着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现实出路作出的深刻思索。目前,学界对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理论、书法、美育方面,对其典型思想关注较少,即便偶有涉及,也仅局限于早期的一两篇论文,缺乏整体、动态的观照。本文通过细读梁启超论述有关典型的文献,结合当时社会形势的发展,系统地考察了梁启超前后期典型思想的具体内涵。梳理、考辨梁启超的典型思想,不仅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的发生有着探本清源的意义,还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把握梁启超的美学思想。

一、前期阶段(1896—1917)

1896—1917年,梁启超主要以政治人物的身份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和西方思潮的汇入与冲击,深刻地影响了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国家安危、民族存亡成为他这一时期关注的中心。1898年,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对维新变法的政治改革进行回顾反思,培养新国民逐渐成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宗旨。1902年,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一文,希望引进西方政治小说,以实现改良群治、国民再造的目标。与此相关,其这一时

期对典型思想的阐释常与政治目的结合在一起,充满着功利性色彩,但他也并没有将典型的审美性弃置不顾。事实上,其美学之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梁启超典型思想的第一重内涵,而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是现代典型理论关注的主要内容。1901年,梁启超在《惟心》中讲到了心物关系,“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1]166},主张发挥主体的意识能动性。在《论冒险进取》中他提出,“实迹者理想之子孙,未来者现在之父母也。故人类所以胜于禽兽,文明所以胜于野蛮,惟其希望故,有理想故,有未来故”^[2],突出强调了希望的主导地位。他认为文学决定生活,“小说为国民之魂”^{[3]371}。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主张著、译为改良群治服务的政治小说。其主张冲击了传统的小说观念,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憾:其一,彻底否定了旧小说,把中国古代小说一律视为“海盗海淫”之作——“综其大较,不出海盗海淫两端”^{[3]370}。其二,过分夸大了政治小说的社会效用,“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37}这种论断,颠倒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忽略了小说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客观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梁启超前期的典型思想虽然没有正确揭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但在理论上开启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先河。

文学形象是梁启超典型思想的第二重内涵,也是现代典型理论的基本内涵。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拉萨尔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5]。马克思反对席勒式的理想化的追求,强调像莎士比亚一样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蒋孔阳认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只有“那些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质规律的某些方面,并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就的艺术形象”^[6]

才能称之为典型。可见,文学形象是迈向文学典型的必由之路。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所谓“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辞,寓谏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的论述^{[3]370}已初涉形象性,表明小说是通过形象发挥作用的。这一观点在其1902年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进一步展开。他提出,小说通过创造一系列鲜明的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艺术境界,如“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厄”“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4]35},发挥“刺”的作用。通过化身一系列书中主人公,如读《野叟曝言》,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必自拟韩荷生、韦痴珠;读《梁山泊》,必自拟黑旋风、花和尚;等等;就能达到“此身非我所有,去此界以入彼界”^{[4]35}之目的,发挥“提”的作用。再加上空间上“熏”的作用——“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4]35}和时间上“浸”的作用——“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4]35},就一定能动和教育读者,改良群治。

英雄形象是梁启超前期文学形象的重要表征。1897年,《国闻报》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引发了梁启超的由衷赞同:“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二人之手。……惟记其中有两大段,谓人类之公性情,一曰英雄,二曰男女,故一切小说,不能脱离此二性,可谓批隙导窾者矣。”^[7]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认为,“相拒之理,其英雄之根耶!相吸之理男女之根耶!此理幽深,无从定论,论其自然之势,则可以二言断之曰: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8]二人从“争存”和“传种”即生存和繁衍的意义上,肯定男女之情、英雄之气为人性的根本。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思想落后、文明闭塞的程度与400年前的欧洲大体等同。内忧外患、生死存亡之际,迫切需要英雄拯大厦之将倾,力挽乾坤。他的《论尚武》《论自由》《论进取冒险》《祈战死》《中国魂安在乎?》等诸多倡导新国民品性的文章包孕着诸多他对英雄内涵的认识,其中寄予了他救国扶危、重塑国民主体的政治期许。

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是梁启超典型思想的第三重内涵。梁启超前期典型思想中有关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首先体现为个体和群体关系。梁启超认为,独立是不依赖外力的,先有个体独立,才有全体独立;合群是合多数独立个体而群。个体和群体利害攸关,枯荣与共。群与群之间角立、竞争,“其群之结合力大而强者必赢,其群之结合力薄而弱者必绌”^{[9]55}。提高群体结合力的关键在于要有“常肯绝身而就群,捐小我而卫大我”^{[9]59}的爱他利他之义。在《公德》一文中,他将中国的旧伦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与西方新伦理(家族、社会、国家之间的伦理)相对照,认为前者重私,后者重公。他认为,全体道德应公私兼善,二者并行不悖。群体、国家为个体、国民提供立身之所,个体、国民怀有报群报国的义务。个体如果不能履责,“无论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蠹贼”^[10]。纵观梁启超这一时期关于个体和群体关系的众多论述,其侧重一般性,围绕着“利群”这一核心,而“利群”在当时背景下又可和“爱国”同等置换。

其次体现为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梁启超认为,一方面,“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11]157},正如有路德后才有新教,有哥伦布后才有新大陆。一方面,英雄是恰逢其会之人。时机成熟了,即使16世纪没有路德,亦必有他人发起宗教改革;没有哥伦布,也必有他人发现新大陆。梁启超最后总结:“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奋英雄。”^{[11]157}英雄顺应时代而生,又促进时代发展,这表明梁启超注意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但他将典型人物理解为英雄、典型环境理解为时势的单一化倾向,又不免简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内蕴。他前期的典型思想对个别和一般关系的理解虽比较粗略,但已显露出现代典型理论的萌芽。

恩格斯认为刻画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该表现他怎样做”^[12]。怎样做是指典型化手法。典型化手法是梁启超典型思想的第四重内涵,同样也是现代典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前期所认为的典型化手法主要包括:

其一,观察和虚构。梁启超认为,“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

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谓慧观。”^[13]观察要突破事物局部的、表面的、

已知的现象，去探求事物整体的、内在的、未知的本质。他评价《新中国未来记》中的人物创作：

“顾尔尔者，吾本粤人，知粤事较悉，言其条理，可以讹谬较少，故凡语及地方自治等事，悉偏趋此点。因此之故，故书中人物亦不免多派以粤籍，相因之势使然也。”^{[14]38}认识到人物创作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梁启超把将人们日常经历中“行之不知，习矣不察”的部分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种种情绪彻底发露的小说称为“写实派”；将“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4]33}的小说称为“理想派”。这里的“理想”指的就是虚构，“他境界”即虚构的世界。他还提醒读者，小说人物具有虚构性，不可将其与现实人物对号入座。“楼阁华严，毫无染著，读者幸勿比例揣测，谓此事为某人写照，此名为某人化身，致生种种党同伐异意见。”^{[14]38}可以看出，在梁启超前期的典型思想中，概括和虚构之间还没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二者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游离性。

其二，倾向性。恩格斯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15]梁启超则不然，他提倡的政治小说通过小说人物之口，直接宣传政见或商榷国计，把小说人物变成作者观念的传声筒。这样的人物形象往往缺乏艺术性，枯燥乏味。梁启超认为，政治小说在欧洲各国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效应。“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3]371}政治小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中亦有重大贡献。“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16]他自评其作《新中国未来记》：“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14]38}可见，梁启超极力提倡政治小说时并非没有意识到它的不足，但出于现实考量他还是有意为之。“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14]37}

梁启超前期的典型思想，试图将艺术的现实使命与小说审美特性相汇通。他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解与对政治小说的认知息息相关，其目的在

于开发民智；他对文学形象、英雄形象的论述目的在于改良群治；他对个别和一般、个体和群体、英雄与时势关系的阐释，同样和新国民所应具备的品格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典型思想的核心宗旨在于培养具有个体道德意识和爱国理念的新国民，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

梁启超的前期典型思想，提出了文学为改造社会服务的主张，开辟了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作为五四“为人生”文学的思想先导，其对当时激进的青年文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灏认为：“梁启超的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7]梁启超前期典型思想中对新国民的提倡和对国民性弱点的批评，深刻影响了鲁迅小说的国民劣根性批判主题。梁启超提出的“新国民，新国家”的美学救国方案，因时代局限没能得到实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观点，可看作是对这一设想的回应与超越，并最终借由国家权力的介入，得到具体落实。

二、后期阶段（1918—1928）

1918—1920年，梁启超进行了一次考察欧洲20余国的游历活动。欧洲之行使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丰裕的物质与先进的文明并没有给西方社会带来期待中的幸福安宁，反而带给人们战争、死亡和信仰的幻灭。面对西方冷酷的社会现实，他的思想发生了转折。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他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类前途的重要意义，希望从传统中找到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智慧，以纠补西方工具理性主义的弊端。由此开端，到1928年终，梁启超致力于传统文化和历史研究。这一时期，他的典型思想延续了前期对文学审美功能的关注，但重心从文学与政治的直接关联转向美与个体自身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倡培养个性自由的“美术人”。

梁启超后期的典型思想，深入地探讨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其实人生之所以复杂矛盾，也不过以心物相互关系为出发点。”^{[18]418}一方面，他承认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含有不可思

议的神秘性,但同时他认为自然界的影响和限制、他人、自身等等都是客观的存在,忽视物的限制,坚持唯心会使个人修养流于空谈,社会设施出现问题,“闹出种种乱子来”^{[18]418}。另一方面,梁启超承认物的重要性,但他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只能顺应环境,人类则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心力改造环境。他提出,坚持唯物必然导致机械的人生观;人类如果是机械的,便没有存在的意义。人与物两者相互作用,不可偏颇。相对于前期“三界惟心”^{[1]166}观点,他这时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文学形象是形成文学典型的基本前提。童庆炳认为,“典型是文学言语系统中显出特征的富于魅力的性格。”^[19]当文学形象在表现审美理想方面达到了艺术至境,就可能形成典型。巴尔扎克曾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跟他相似的人们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20]“类的样本”是说典型具有代表性。梁启超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21]213}《史记》每一篇列传,都是某方面重要人物的代表。如《苏秦、张仪列传》代表对战国局势有深刻影响的游说之士,《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代表当时的新贵族势力,《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代表当时社会上游侠、刺客构成的特殊群体。这些列传并不是单单替一个人的生活起居作记录,而是用人物的活动来反映社会现象,篇篇都有深意。“最鲜明的性格特征”指的是人物的个性。梁启超认为,“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我们应该为他们作专传。”^{[21]229}如《史记》中《鲁仲连传》中鲁仲连,性格俊拔,谈笑之间退秦军,却不接受应得的奖赏。其非凡的行为,令人叹服。《后汉书·臧洪传》中臧洪知恩图报,杀身取义,慷慨凛冽的秉性,令人钦佩。他们的举动虽对历史发展几乎没有影响,但其特别的思想、特别的性格,值得表彰。因此,梁启超理解的代表性是伟大人物的代表性,个性是特别人物的奇特性。他曾表示,特别人物之于代表性人物,“好像燕窝鱼翅的酒席,须得有些小菜点缀才行。”^{[21]229}小菜和鱼翅不能等同,代表性和奇特性自然不能

统一。其认识离巴尔扎克所说的典型形象还有不小的差距,但相较于其早期对典型形象的理解有了明显的进步。梁启超在其典型思想的后期,已经深刻认识到,小说应该塑造反映一定社会风尚的代表性人物和性情举止独特的人物形象。

关于女性形象的论述,也是梁启超后期典型思想的重要内容。首先,针对近代文学家写女性以“多愁多病”为模范的弊病,梁启超梳理了文学传统中女性审美标准的衍变,提倡女性具有刚健、婀娜的体格。“《诗经》所赞美的是‘硕人其欣’,是‘颜如舜华’;楚辞所赞美的是‘美人既醉,朱颜酡,娉光眇视,目层波’;汉赋所赞美的是‘精耀华烛,俯仰如神’,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凡这类形容词,都是以容态之艳丽和体格之俊健合构而成。从未见过以带着病的恹弱状态为美的。”^{[22]68}“刚健之中处处含婀娜,确是女性最优美之点”^{[22]65},是生命活力和性别魅力的和谐统一。其次,梁启超将女性视为独立的生命个体,希望女性具有高贵的人格。他将六朝后的女性描写分为两类:一类以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其书写了女性的高洁品格。如杜甫《佳人》中的佳人,“品格是名贵极了,性质是高亢极了,体态是幽艳极了,情绪是浓艳极了”,是“描写女性之美”的“千古绝唱”^{[22]66}。一类以李义山、柳屯田等为代表,这些人品性堕落,不尊重女性,“理想中美人不过娼妓,完全把女子当玩弄品,侮辱了女子人格”^{[22]66}。他们的作品在文学界留下许多遗毒,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梁启超的理想女性是刚健与婀娜、天然与高贵的和谐统一的女性。“她不仅是文学艺术所勾画的美丽形象,也是新时代所期待的美丽新女性。”^[23]他的这些论述启发了中国女性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重塑人格尊严。与前期从现实关切出发的粗线条英雄形象相比,后期的女性形象回归于文学本身,兼具艺术性和思想性。

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是梁启超典型思想的第三重内涵,这也是现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内涵。梁启超后期对个别和一般关系的理解集中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

首先,梁启超探讨了民族人格、阶级人格、党派人格的形成。他认为历史事实是人类心理的反映,“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

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21]124}因而，研究人格是研究历史的关键。“人格者”可区分为“少数人格者”和“多数人格者”。他认为应特别注意个人的特性，因为个人的特性不单影响私人生活，实际上还影响了公共生活。如袁世凯的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近十年民国的局势就可能全然不同。“多数的人格者”是将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视作一个人来观察他的心理，名为民族人格、阶级人格、党派人格。此种人格，“以其意识之觉醒，觐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觐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觐其人格之扩大。”^{[21]125}如欧美劳工具有阶级人格，中国劳工则无，因为中国劳工没有阶级意识。他认为，中国近十年的政党不具备党派人格，因其没有组织、没有运动。梁启超揭示了集团性的形成，他提出的民族人格、阶级人格、党派人格，实际上就是民族性、阶级性、党派性，其论述丰富了一般性的具体内涵。

其次，梁启超探讨了个人性和集团性、时代性之间的关系。梁启超将一定时间空间中性情举止影响深刻、广泛，几乎覆盖整个社会，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命名为“历史的人格者”；这其中又分为“首出的人格者”和“群众的人格者”两类。实际上其与“少数人格者”和“多数人格者”意义相同，呈现出由一人或数人向团体、群体演进的趋势。“首出的人格者”意指从表面上看，一切历史好像都是一人或数人活动的结果，“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21]119}自孔子思想产生以来，至少有一部分人受到了其思想的深刻影响，其可谓“孔子个性之集团化”。战国时，各国统治者受到商鞅思想的深刻影响，其可谓“商鞅个性之时代化”。“群众的人格者”理论上是群中各分子以平等的方式表现其个性，实际上其同样是集团性和时代性的体现，并且其需要领袖人物的指导。比如，把所有信奉共产主义的人视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就必须看到马克思和列宁在这一群体中的指导性作用。梁启超最后总结，历史的奥秘在于探究“一

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21]120}。这实质上表明，个人性影响时代性、集团性，时代性和集团性又通过个人性具体表现出来。梁启超对个人性和集团性、时代性关系的深刻洞见，触及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典型理论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重要内涵，是其对前期英雄观和时势互动关系认识的深化。

最后，梁启超探讨了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关系。1922年，面对今时青年“遮拾欧、美学说之一鳞一爪”^{[24]201}作为抨击之资诽谤先贤的情状，梁启超指出，中国先哲优美的人生观对今日社会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社会纷繁、复杂，诸如议会、学校、工厂这类“以个人纳其间，眇若太仓之一粟”^{[24]203}的大规模社会组织，用整齐划一的标准规训人类，使众人同冶一炉、同铸一性，使其个性尽被社会性湮灭。显然，梁启超认为机械性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理想方案。如何使愈来愈扩大、愈繁复的社会成为与时俱进、充满活力的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他相信中国先哲早有暗示。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梁启超认为，佛教中最具中国特质的禅宗与儒家有相通之处。“禅宗曰：‘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即孔子立人达人之意。盖宇宙最后目的，乃是求得一大人格实现之圆满相，绝非求得少数个人超拔的意思。”^[25]两者的共同目的，都是希望人们将精神方面的自缚解放净尽，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所谓立人达人就是把每个人的天赋，“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26]，发挥到十分圆满，“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27]。人人自立，不必仰人鼻息；各审其性，各用所长，创造进化，组成进步的社会。梁启超广泛引征儒家先贤和佛教禅宗保有个人性的思想，追求个别和一般的和谐平衡。梁启超前后期都是从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出发来思考个人和群体的关系的。其前期论述的核心是“利群爱国”，依据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侧重一般；后期论述的核心是个性化中心之“仁的社会”，依据是他认为机械性的群体主义会湮灭个性。他追求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和谐平衡，讲求个别和一般的统一。

典型化手法是现代典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性化是梁启超后期主张的典型化手法。梁启超认为,“凡记述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之处。”^[28]人的性格具有相通性,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人,相似性更多,但性格只会相似,绝不会雷同,一个社会中绝不会找出两个相同的人。他举莫泊桑初写小说时通过观察十个车夫动作的不同才写出人物的个性和《水浒传》塑造了数十个面目各异的成功人物为例,说明个性化在典型塑造中的重要作用。梁启超认为《史记》深得其中三昧:一是事无论大小,只选择能突出表现人物个性的事件。《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详记完璧归赵及渑池之会两件大事,因这两件大事最能表现蔺相如的个性。同样,廉颇一生的卓越战功草草略过,但司马迁反倒把他妒忌蔺相如、负荆请罪等体现人物性格的小事写得十分周详。二是以细腻传神的语言刻画人物个性。《酈食其列传》中捕捉住酈食其那些个性十足、惊世骇俗的言论,将他说话的内容和说话的神气原样描出,寥寥数语,便活画出一位胸有经纬、倜傥不群的老名士形象。三是通过侧面描写的方法描写人物。

《信陵君列传》通过详写信陵君怎样对待夷门侯嬴、屠夫朱亥、博徒毛公、卖浆薛公,以侧面描写手法刻画出了一位极为奇特的贵公子形象。显然,比之前期,梁启超后期对典型化手法的认识,明显借鉴了中西方作家塑造成功人物形象的经验,更强调要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刻画出人物的个性。

梁启超后期的典型思想,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从美的“趣味”与“情感”特质出发,注重典型的艺术性和感情性。其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辩证地认识到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在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中追求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动态平衡,尊重个体生命的精神欲求;在典型化的手法中张扬个性之美;把理想女性看作自由生命人格“美术人”的直观体现。他的典型思想将美的实现与理想人生的追求相关联,目的是培养“美术人”,而所谓“美术人”是“一种与生命内在精神和理想相契合的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自由的新国民”^[29]。其与前期的“新国民”概念一脉相承,但有其更高的意义。

梁启超后期的典型思想,由对社会变革的思考转向了更为深沉的人性层面,侧重于美与人生、人性关系的研讨。其富有前瞻性地对西方的“科

学万能”、工具理性主义进行反思,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梁启超的典型思想夹杂于哲学、文化、历史、政论、文学等著述中,有一定的变动性,显得宏阔有余、精密不足。其对典型的社会作用与典型的审美作用的认识也时有矛盾,但代表了西学东渐这一特殊时期他找寻救国方案所做的积极努力。梁启超前两个阶段的典型思想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典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话语资源,奠定了20世纪中国典型理论的思想基础。研究梁启超的典型思想,不仅对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的发生有着正本清源的意义,而且对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30]梁启超的典型思想始终坚持文学与社会人生相联系,始终坚持通过美的启蒙功能来塑造具有完善个性的新国民形象,体现出他对典型形象的独特理解与建构。对梁启超典型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能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理论提供富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惟心 [M]// 梁启超. 梁启超文选: 上卷. 夏晓虹, 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20.
- [2] 梁启超. 论冒险进取 [M]// 梁启超. 梁启超文选: 上卷. 夏晓虹, 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20: 86-87.
- [3] 梁启超. 译印政治小说·序 [M]// 梁启超. 饮冰室书话. 周 岚, 常 弘, 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 [4] 梁启超. 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G]// 陈平原, 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1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5] 马克思. 致斐·拉萨尔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55.
- [6] 蒋孔阳. 形象与典型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 155.
- [7] 梁启超. 小说丛话 [G]// 陈平原, 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

- 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67.
- [8] 梁启超．本馆附印说部缘起[G]//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9.
- [9]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M]//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上卷．夏晓虹，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
- [10] 梁启超．公德[M]//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上卷．夏晓虹，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82.
- [11] 梁启超．时势与英雄[M]//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上卷．夏晓虹，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
- [12] 恩格斯．恩格斯致斐·拉萨尔[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8.
- [13] 梁启超．慧观[M]//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上卷．夏晓虹，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168.
- [14]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G]//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5]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3.
- [16]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G]// 付祥喜，陈淑婷．粤派评论丛书·大家文存：梁启超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224.
- [17] 张 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崔志海，葛夫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235.
- [18] 梁启超．非唯[M]//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下卷．夏晓虹，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
- [19]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修订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15.
- [20] 巴尔扎克．一桩无头公案·初版序言[G]//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137.
- [21] 梁启超．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 [22]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感情[M]//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下卷．夏晓虹，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
- [23] 金 雅．论梁启超对中国女性文学的贡献[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6)：113.
- [24]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25]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M]//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下卷．夏晓虹，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315.
- [26]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上卷．夏晓虹，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314.
- [27] 梁启超．与孩子们[M]//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下卷．夏晓虹，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452.
- [28] 梁启超．作文教学法[M]//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下卷．夏晓虹，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92.
- [29] 钱中文．我国文学理论与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发动：评梁启超的“新民”、“美术人”思想[J]．社会科学战线，2008(7)：129.
- [30]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12-15(1).

责任编辑：黄声波